周作人创作的民初原点
——以地方自治、乡绅生活与地方性美学为中心

冯仰操

摘要：民初周作人从绍兴、边缘走向全国、中心的过程中，以地方为起点，并将地方性作为社会事业、日常生活和美学旨趣的内核，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和个性。他投身现代地方自治，以社会教育与儿童教育等教育文化为重心，并借助现代民俗学的考古发掘进行国民文化的重构；亲近传统乡绅的闲暇生活，热衷收藏清玩、游赏、饮馔、整理乡邦文献等日常生活，并在精英化、艺术化中彰显平民化、学术化；建构地方性美学，聚焦乡邦文献中的地方文人、地方古迹和地方风土，并发掘古今雅俗的另类谱系或关联，为新文学源流、散文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型。

关键词：周作人；地方自治；乡绅生活；地方性美学

The Origin of Zhou Zuoren's Creative Work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entered on Local Self-Government, Gentry Life, and Local Aesthetics

Feng Yangcao

Abstract: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s Zhou Zuoren moved from Shaoxing and the periphery toward the national center, he took the local as his starting point and made localness the core of his social undertakings, everyday life, and aesthetic pursuits, displaying a distinct sense of the times and individuality. He devoted himself to modern local self-government, focusing 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such as social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drew on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modern folklore studies to reconstruct national culture. He embraced the leisurely life of traditional gentry, engaging enthusiastically in daily activities such as collecting curios, sightseeing, dining, and organizing local literature, manifesting a plebeian and scholarly character within an elite and artistic orientation. He constructed a local aesthetics, focusing on local literati, local historic sites, and local customs in local literature, and explored alternative genealogies or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efined and the popular, ancient and modern, providing important prototypes for the origins of new literature and prose creation.

Keywords: Zhou Zuoren; local self-government; gentry life; local aesthetics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地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其早年生命的栖息地，也是贯穿其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关键词。对于周作人而言，地方是不断发现的，也是不断内化的，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民初的七年。周作人 1911 年从日本返回绍兴，直到 1917 年离开绍兴进京，这段时间是其一生志业的奠基期，在事业选择、生活取向和美学旨趣等方面多以地方为中心，并蕴含了日后全国性发声的多种可能性。

唯有重返立体的历史情境，才能接触或接近一个文人选择和发声的本来面目。绍兴时期，各种现代潮流和传统因袭构成了周作人身处的历史情境。一方面，他承受着不同方向的影响，既是投身地方自治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延续传统生活趣味的新乡绅。另一方面，他又有主动的选择和建构，如在现代潮流中，他通过绍兴县教育会进行现代政治的操练，并立足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来重建现代国民文化，开启了民俗调查和儿童文学研究，又如在传统因袭中，他亲近清玩、游赏、饮馔、古籍购阅等乡绅的惯习，在日常生活精英化、艺术化的同时表现出平民化、学术化的倾向。在现代潮流和传统因袭的共同影响下，周作人初步酝酿了以地方性为核心的美学观，确认文学的地方差异性，并且聚集于乡邦文献中的地方文人、地方古迹和地方风土，发现了古今、雅俗的多重关系。从周作人的一生来看，民初的地方自治、乡绅生活和地方性美学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构成了他之后社会改良、日常生活和艺术构造的原点。

一、地方自治：县教育会与地方文化考古

先驱者并不能自外于时代的潮流，往往是借势而为。政治或泛政治生活，是民初周氏兄弟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教育部之于鲁迅，绍兴县教育会之于周作人。无论中央的教育部还是地方的教育会，都是现代政治建构的产物，趋新的因子占据主导。置身其中的周氏兄弟，并非牵线木偶，经常主动作为，将平台的优势与个体的关切结合在一起，并且上下呼应，遥相配合。与鲁迅相比，周作人身处地方，涉足的是地方自治尤其是教育自治，作为县教育会的两任会长，既是全国性潮流的践行者，也是地方新事业的开拓者。

自晚清至民初，地方分权、民主选举等现代政治制度输入中国，其中，地方自治影响最广，为新式士绅或现代知识分子所熟悉。地方自治落地中国后，一直被视为官治的补充，清政府 1909 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袁世凯政府 1914 年颁布的《地方自治试行条例》亦要求“承县知事之监督，办理地方公益事宜”。所谓地方公益，大体包括教育、卫生、慈善、交通、农工商等事项。虽然地方自治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却为中国士人提供了现代政治操练的平台，也为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深化提供了现实基础。

周作人很早便对地方自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绍兴一地作为试验田。1910 年，周作人肯定地方自治，宣扬地方选举的重要性，“畀以选举之权，使择其仁富谨厚众望素孚者以为代表，不特可以免前弊，抑地方之幸福，且由是而增进”[①]。地方自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制度，并不以地方自限，而以民族国家为框架。受此影响，周作人形成了一种面向国家的地方观念，并排斥狭隘的地方主义，如指出“同为自治，镇之争，乡之争，区域广狭之争，比比皆是”，“第研究其事前之预备何如，事后之施设何如可矣。不于是而求其

① 周作人：《选民释义》，《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73 页。

完备，龂龂然而为无意识之争，夫宁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也耶？”[①]，又指出“东南半壁，方脱虏系，而内讧频闻，形同割据。近传台绍诸郡，亦谋分立，虽曰流言，虑非佳兆”[②]，将地方分立视为越人之耻。

当绍兴光复后，周作人期待能够出现新的局面，“予生于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为之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③]，并与兄弟一起呼吁“比者华土光复，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为之首涂”，但他们理想的自治路径是教育，因为“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所以“今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④]。其中，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正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后周作人加入绍兴县教育会（以研究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为主），1913 年 4 月当选绍兴县教育会会长，1915 年 4 月再度当选（两年一届），一直到 1917 年 3 月赴京前夕才卸职。

教育会，早在清末便大量出现，最初是民间性质的现代社团，之后成为典型的地方自治机构。1903 年 3 月 8 日，绍兴教育会创立，是由旅沪的蔡元培、杜亚泉等发起的民间社团[⑤]，“以绍兴全府人民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为目的”[⑥]。1906 年，学部开始将教育会规范化，规定其设立的宗旨，“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应与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络一气”[⑦]。1908 年，地方自治正式推行后，作为地方自治辅助结构的教育会广泛设立。自 1908 年开始，山会教育联合会、上虞教育会、诸暨教育会先后成立。1912 年，教育部进一步规定“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 项，力图教育发达为目的”，特别指出“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及教育以外之事”[⑧]。民初的绍兴县教育会，正是依据教育部相关章程所改设。

绍兴县教育会，是经县公署核准立案的民间教育组织。1913 年 3 月，“该会会长宋琳君辞职后，公举周作人君为会长，即于四月廿七日，在该会事务所开评议会，酌定章程，筹议进行办法”[⑨]。宋琳，即宋紫佩（1887—1952），辛亥革命时任教绍兴府中学堂，与陈去病、鲁迅等人一起发起越社，创办《越铎日报》，并被公举为绍兴教育会会长，1917 年 3 月离开绍兴。在周作人接手后，绍兴县教育会公布了新章程，并创办了会刊，显示出更多的新气象。

周作人担任会长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4 年 11 月 20 日改名《绍兴县教育杂志》）创刊，利用之前学术讲演会的经费，“以播学术而通信息”[⑩]。通过该刊，可透视地方教育会运作的细节，亦可观察周作人对公共事务与个体趣味的调和。

教育会作为介于官民之间的组织，既有自治的一面，也有官治的色彩。一方面，教育会下设

① 周作人：《宪政编查馆致各督抚自治员电文书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160 页。

② 周作人：《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229 页。

③ 周作人：《望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224 页。

④ 周树人、周建人：《维持小学之意见》，《越铎日报》1912 年 1 月 19 日。

⑤ 杜士珍：《论沪上建设绍兴教育会事》，《新世界学报》1903 年第 2 期。

⑥《绍兴教育会详细章程》，《绍兴白话报》1903 年第 13 期。

⑦《学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1906 年 7 月 28 日）》，收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598 页。

⑧《教育部公布教育会章程（1912 年 9 月）》，收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281—282 页。

⑨《绍兴县教育会开会纪闻》，《教育周报（杭州）》1913 年第 5 期。

⑩《本会纪事》，《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3 年 10 月 15 日第 1 期。

评议会、教育方法讨论会等，有评议和选举等常规活动，俨然是一自治的操练平台。另一方面，教育会要在学校、县公署乃至教育部等行政机构之间做传达、沟通的工作，与教育行政机关存在交集。在县教育会的具体运作中，作为会长的周作人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教育会有会长、副会长各一名，评议员二十名，庶务兼会计员一名）。在日常议会和大会中，会长是主持人，并且在集体议决不定时，享有议决权。在与上级机关的来往函电中，会长是教育会的代表和署名人。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政治实践，是为了激发地方活力以建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周作人对教育行政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之所以如此，源于周作人对制度与种性的理解，他认为国民文化或民族性远比制度重要，“即有良法美意，不适其性，亦莫能用”[①]。故在执掌教育会的初期，他便刻意避免过多的官方色彩，特别强调从事研究性的活动，“会长言，本会宗旨在研究教育，为教育学会性质，非补助教育行政之机关，故于研究一项似应加重。王子余君言，宜每月开研究会一次，会员得以研究所得寄至本会编入月刊，分发以备开会时讨论。”[②] 在疏离政治的同时，周作人热衷于培养民性的教育文化，尤其是关于教育方面的研究和调查，至晚年回忆时也认为所接触的“单说绍兴本地，而且只是教育文化一面的事情”，“给公家做的事并不多，剩下来做的都是私人的事”[③]。

不妨比较当年的两个章程。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创刊号中，首列《教育部公布教育会规程》，次列《绍兴县教育会章程》。教育部章程规定，教育会研究事项涉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与之相比，绍兴县教育会“以筹议本县教育事宜，力图教育发达为宗旨”，但筹办的事项是对前者的细化或扩大化，包括学校教育事件、教育经费事件、学校设置及变更事件、风俗改良事件、戏曲及通俗文学检查事件、各种兴行物取缔事件、古迹及美术品保存事件、家庭教育研究事件、儿童游戏品检查事件、其他有关事件等十项[④]。同时，教育会还专门成立调查部和学术讲演会，其中，调查部将学校现状、社会风俗、古迹美术作为主要调查事项，社会风俗调查包括公众信仰、庆吊仪式、家族情形、公众娱乐和社会道德等条，古迹美术调查包括古迹名胜、先贤祠墓、寺观之有来历者、美术品、古代器物足为学术研究资料者、天然物为世稀有者等条[⑤]。绍兴县教育会两个章程的细化条款，并非周作人等人的发明，大都是官方呼吁在前，但它们的列入，却有赖于周作人等人的卓识[⑥]。如保存古迹，早在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08）、《京师地方自治章程》（1910）都将其列入自治事宜，1909 年民政部《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出台了调查和保存两方面的详细办法，至民初，内务部推出《通咨各省保存古迹办法》（1916），基本延续了清末的做法。

在民初的教育领域中，与面向学生的学校教育相比，面向民众的社会教育和面向儿童的家庭教育处于弱势，但后者却是周作人寄托自身理想

① 周作人：《共和国之盛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241 页。

②《本会纪事》，《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4 年 1 月 15 日第 4 期。

③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3 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36、446 页。

④《绍兴县教育会章程》，《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3 年 10 月 15 日第 1 期。

⑤《绍兴县教育会调查部及学术讲演会简章》，《教育周报（杭州）》1913 年第 5 期。

⑥ 周作人在 1913 年 4 月 22 日日记中写道“同乔风拟章程二通”，可知教育会的两个章程代表了周氏兄弟的个人意见。

的重要平台[①]。周作人热衷地方自治，具体而言是通过民众教育、儿童教育重构国民文化或国民性。但在具体路径上，周作人一面强调启蒙的提高，一面呼吁考古的发掘。两种方式有内在的冲突，若强调启蒙，“当于化导之先，申其禁罚，然后旧污可湔，而新化可行也”，那么流传的小戏、闲书、山歌等将成为厉行禁止的对象，若强调考古，则“越地故国名胜，保存之谋，今不容忽”“夫破除迷信者，在于改革敝习，而非拔除宗教，况建筑雕塑，别属艺术之部，保而存之，所以供赏鉴，资研究，非留为崇拜之资，旨趣自别，谊至明了也”[②]。从主导的倾向看，后者成为周作人投身的重心，他特别看重以地方为起点的民俗调查和儿童文学研究等。

如社会风俗、古迹美术的调查、研究被列入教育会章程，本应是公共的事业，但在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却成了周作人等人坚守的个人志业。周作人专门提及“本会调查部章程，于学校调查之外，本有风俗、古迹、天物等调查，因无经费，未能举行。今由会员私人担任，随时报告刊登，以供公览”[③]。民俗调查的背后，隐含着周作人对民众和国民文化的期待，“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④]，也如王芳所言是周氏兄弟等精英知识分子借地方古迹作为与民众沟通的中介，以追求新的文化认同的建立[⑤]。

周作人将个人的调查成绩刊布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本地的社会风俗、古迹美术等构成了主要的方向：

第1、3期《古迹调查》：王羲之祠、唐将军庙、石篑山房；七星岩。

第2期《风俗调查二》：越俗。

同样努力的还有周建人，他也进行了风俗调查、天物调查，并以“高山”为笔名发表文章。但周氏兄弟的努力，并未成为普遍的公共事业，也未能持久下去，之后的会刊未见后续的调查。

又如儿童文学研究，周作人更是筚路蓝缕的先驱者。周作人认为“儿童者，未来之国民”，“第在中国，则儿童研究之学固绝不讲，即诗歌艺术，有表扬儿童之美者，且不可多得”[⑥]。1913年开始陆续发表《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之研究》等理论文章，并呼吁国人注意对儿歌童话的收集。之后为了收集材料，一方面强调田野调查，专门发布《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声明“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⑦]，并发表《童话释义》，“所收皆越中传说，以儿时所闻者为主”[⑧]，另一方面强调文献整理，专门刊登了《古童话释义》，为《吴洞》等古代童话进行现代的诠释。

从时代的潮流看，地方自治是当时中国普遍实践的现代化事业，并且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周作人身处其中，在潮流与志趣间寻找平衡，将教育文化作为自身事业的重心，并且酝酿了独具一格的思路。启蒙与考古，代表了清末民初先后出现的两种思路。以古迹保存为例，晚清以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大都强调自上而下的启蒙，无视民众

① 周作人认为“外缘之影响，今古同揆，此社会教育所由为今务之急。若家庭教育，重在作始，性情变异，悉定于此，为尤当先也。”参见周作人《家庭教育一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53页。

② 周作人：《论保存古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52页。

③《古迹调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3年10月15日第1期。

④ 周作人：《望越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23页。

⑤ 参见王芳《留学归国后的周氏兄弟与乡邦文献——辛亥革命和地方自治中的文人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⑥ 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46、247页。

⑦ 周作人：《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同上书，第292页。

⑧ 周作人：《童话释义》，同上书，第354页。

的真实需求和迷信背后的深层因素，将庙宇等宗教建筑当作反迷信的对象。而周作人代表的一群人倾向于古今中西的考古，正视民众的悲哀和迷信的多面性，并从中寻觅文化重建的契机。周作人考古的背后，是一种现代的学科视野，即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视野。人类学、民俗学不仅让周作人重新发现了民众、儿童的文化艺术，并且为周作人提供了具体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视角，由此确立了一种重建国民文化的大道。对传统的考古，还受到固有的乡绅传统的强劲影响，接下来从周作人的乡绅生活进一步讨论。

二、乡绅生活：日常生活的平民化与学术化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在讨论地方自治时，对传统的乡绅阶层持质疑的态度，“因地制宜，不得不藉旧日绅董为他山之助，势也。然以彼刁绅劣董之擅弄威福，横行乡里已久，今又假手于若曹，民已惴惴焉惧。虽竭诚尽虑，为地方谋幸福者不乏其人，然祥麟威凤，不易数觏；而把持垄断，藉公益以阴济奸私转什而八九”[①]，并将绍兴各县毁学的起因归之于绅，“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而在于绅”[②]。显然，周作人不认为传统的乡绅能够担负地方自治的重任，隐含之意是寄望于他所属的现代知识分子。但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乡绅阶层蜕变而来，在挣脱传统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带着传统的烙印[③]。尤其是身处地方社会的现代知识分子，被固有的社交网络、家庭氛围、地域文化等生活空间、文化空间所影响或限定，表现出对传统乡绅生活的亲近。

乡绅作为明清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在众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张仲礼先生归纳的“承担着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④]。整体而言，传统乡绅栖身的领域主要有地方治理和文化传承。通过地方治理和文化传承，传统乡绅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本，进而在物质享受、精神追求等日常生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精英化、艺术化的生活惯习。

在转型时代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地方自治、社会启蒙逐渐取代传统乡绅的地方治理、儒家教化等，但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新旧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互动或缠绕。如在现代化的开端，传统乡绅不仅被视为理想的承担者，并且是事实上的开拓者。又如新知识分子的崛起，往往出身于乡绅家庭，并且共享着众多相近的生活理想、文化趣味。如民初周作人，便拥有多重身份，是拥有现代政治观念、知识框架的知识分子，也是怀旧的乡绅子弟或新乡绅，而且这些身份和谐统一。“在中国文化中，个体身份很大程度上来自个体所处的关系网。”[⑤] 作为新乡绅的周作人，一个重要的表现或依据是他的社会交游。传统乡绅，介于官民之间，依赖功名学历、土地财富等构建了一个由地方精英构成的关系网。“结构可以是稳定的，人却是流动的。民国乡村社会结构无根本性变动，不唯‘士农工商’职业分层结构依然存在，即使

① 周作人：《宪政编查馆致各督抚自治员电文书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160 页。

② 周作人：《论馀上新嵊毁学案》，同上书，第 191 页。

③ 吴晗很早便指出“今日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过去时代的士大夫，过去的士大夫有若干的特性还残存在今日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里面”，参见吴晗《论士大夫》，收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1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第 48—51 页。

⑤〔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8 页。

在官——绅——民社会权力结构模式上也无大的变动”[①]，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进入地方后，便融入乡绅阶层而成为新乡绅。周作人正是如此，作为返乡的留日学生，很快便建立了一个与传统乡绅相似的精英网络。

从日记可知，周作人交游的对象，一类是鲁迅、周建人等兄弟、族人，一类是县署、教育会、中学等地方政界、学界人物。可以说，民初周作人的交游基本是地缘性的，即以家族、地方性社团为中心。从历时性上看，周作人一开始的交往限于家族内部，尤其是兄弟之间。周作人与鲁迅、乔峰的交游极为频繁，与在京的鲁迅是通信寄件的方式，与在乡的乔风是结伴同行的方式，一直保持着每月十次左右的频率。自 1913 年 3 月周作人进入中学和教育会后，交游范围扩大，与地方新学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与传统乡绅相比，周作人是新的地方精英，凭借的不是传统功名，而是地方自治带来的权力资本。作为地方精英，周作人主持教育会，不仅领县署的津贴，与县知事等官员建立了直接关系，并可以进入县教育行政会议议事。

在传统中国，地缘与血缘密不可分，个人荣誉总是与家族荣光紧密联系。新乡绅，不仅对地方事务，还对家族事务抱有积极的态度。当周作人返乡之后，便沉浸到一个充满传统仪式感的环境中，夏至、冬至、年关等重要节气的祭祖无疑是其中的重头戏（当人们离乡以后，便被地缘所牵绊，如旅居绍兴会馆的鲁迅有祭祀乡贤的活动）。隔三差五的祭祖仪式，唤起周作人对家族荣光的憧憬。像传统乡绅一样，为了宣扬或恢复家族的荣誉，周作人也试图大动土木，恢复先祖的“一蔬轩”书斋等。据陈文辉考证，周作人自少年起便大量使用与家族故实有关的斋号、室号，尤其是到了民初，甚至开始收购房产，打算重修“一蔬轩”，却因为近邻梁家的干涉而失败[②]。虽然“一蔬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却成为周作人文章中的精神家园，表现为 1917 年重订的《一蔬轩杂录》和 1943 年拟结集的《一蔬轩笔记》（后改名《药堂杂文》）。

作为新乡绅的周作人，对乡绅传统的延续，不仅表现在社会交游、家族传承方面，更表现在清玩收藏、游赏、饮馔、乡邦文献整理等日常生活方面。可以说，周作人对新乡绅身份的认同，更多是对以闲暇为特征的日常生活惯习的认同。

欲讨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首当其选的是日记文献，因为其保留了日常生活较为原初的一面。周作人的民初日记自 1912 年 10 月开始，对之进行关键词的谱系梳理，会发现乡绅生活诸元素逐渐增加，终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妨列 1914 年正月日记中的部分事件：

一日　下午同乔风至大路，得绍熙、景定、绍定折二泉、常平五铢各一。晚阅《萝庵游赏小志》。

二日　下午书估王晴阳持《会稽掇英集》来。

四日　下午编《月刊》了。

六日　书贾王某来，购《小尔雅疏》《佩纫仙馆吟草》各一册。

八日　上午至公署纳地丁税。至教育会一转。

九日　寄北京书四包，内《掇英全集》《笠泽丛书》《初学记》等共十六本。

十一日　上午至县署，见金知事及第三科长阮。

十二日　买《吴越备史》一部二本。

十八日　叔社方假地开会，遇陈、施诸人，属主小说编辑事。

①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84 页。

② 陈文辉：《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 年，第 104—111 页。

廿二日　夜半祝福、祀神。信房值年。

廿三日　阅《越缦骈体文》晚约略了。

廿五日　上午悬祖像。购《新年越中竹枝词》一本，章鞠僧表叔著，不佳。晚祀祖分岁，又同乔风携灯至清道桥一游，由大云桥归。

短短一个月的日记，却涉及周作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新乡绅生活的标本。

周作人对家族传统、先祖书斋的恢复，实质上是对乡绅日常生活的向往和靠拢。乡绅、士大夫、文人，在传统中国往往是重合的，物质享受、文化需求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乡绅的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并不割裂，很多时候浑然一体，如对清玩、游赏、饮馔、古书的追求和欣赏，充分体现了物质生活的雅化和艺术化。在周作人的民初日记中，清玩、游赏、饮馔、古书频繁出现。但周氏对这些日常生活的追求和欣赏，并不始于民初，可以上溯到青少年时期[①]。周作人早年是典型的乡绅子弟，至民初成了独立的新乡绅。作为新乡绅，当他栖身于地缘和血缘网络中，有了一定的财力和闲暇后，便更加主动建构传统乡绅式的生活空间。

清玩，是传统文人书斋的必备品。所谓“清玩”，包括文房器具、书画、古董、金石，以及奇石、异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鱼，乃至窑器、漆器、竹器、锡器等，在明清时期，不仅成为文人生活中赖以消遣自适、构建艺术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资源，也成了借以确证身份、标榜风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②]。周作人晚年回忆，“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这种金石小品，制作精工的也很可爱玩，金属的有古钱和古镜，石类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我所有的便多是这些东西”。[③]这里的金石小品，正是文人清玩的一部分。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基本与其回忆一致（周作人的晚年回忆以日记为基础），从 1912 年 10 月到 1917 年 3 月，从收藏的频次上看，依次有拓本（46 次）、古钱（21 次）、古砖瓦（15 次）、古镜（6 次）等。此外，周作人还购阅《古泉汇》《古镜存》《古砖图释》《两浙金石志》一类的书籍，还始终收集各种时兴的玩具（78 次）。从周作人收藏的清玩、玩具来看，并不以贵重、罕见为标准，多为当地的流通之物。

游赏同样是乡绅文人所热衷的。当人们走出书斋，于是有园亭之游，继而走出户外，于是有大街、集市之游，继而走出城市，于是有山林、乡间之游。明清时期，士大夫们“最常参与的旅游活动并不是探险性质的‘壮游’，而是休闲性质的‘浅游’”[④]。对于周作人而言，同样也是浅游，而且所游的地点以绍兴城内为主，所赏的对象以风景为代表。据日记看，周作人日常活动半径很小，除了家、教育会、中学外，便是大街、大路等商业街道，以及渡东桥、大云桥、咸欢河沿、塔子河、塔山（怪山）、蕺山（王家山）等游玩之处，偶尔去城外的禹庙、兰亭、娄宫、吼山等风景名胜处。就游赏而言，周作人同其推崇的“都会诗人”张岱一样，主要在绍兴城内的悠游。再看周作人游赏的内容，却是多自然风景而少人事，如五云门拔石莲花（1912 年 10 月 12 日）、观巷花园观两久花（1912 年 10 月 16 日）、府学前拔蒲公英（1913 年 3 月 12 日）、南河港田间拔白华等（1913 年 3

① 参见丁文《文体与思想：周作人早年日记中的饮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乡间风景”的发现——周作人早年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的生成》，《鲁迅研究月刊》2014 年第 5 期；《早年周作人“苦趣”心态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

② 赵强：《“清玩”与文人生活美学》，《人民周刊》2019 年第 10 期。

③ 周作人：《金石小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3 卷，第 460 页。

④ 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299 页。

月 26 日）、会稽山拔白色堇花（1913 年 3 月 28 日）、大云桥欣赏彩虹（1913 年 10 月 8 日）、府学前拔野菊（1913 年 10 月 24 日）、咸欢河沿观草花（1913 年 10 月 28 日）、吼山观云石（1915 年 6 月 28 日）等。此外，周作人还试图将休闲性的游赏和现代的田野调查结合。在日记中，有一些古迹遗存调查的记录，如蕺山下观王右军像等（1913 年 1 月 22 日）、吼山观石篑山房（1913 年 9 月 27 日）、观宋六陵（1914 年 3 月 29 日）、观城隍庙殿（1914 年 10 月 4 日）。

游赏常常伴随着饮馔，当然饮馔不限于游赏之时。周作人的日记极简略，却将饮馔作为必备项之一，并偶尔加上“佳”“颇佳”等评语。整体而言，周作人讲求饮馔，如追求新鲜，常向上海春驹堂邮购西式食物，但以日常的市井享受为主，如常去街上饮茶、食面、吃馄饨等。从饮方面看，出现频次最高的是酒（162 次，多在家中、都亭桥、大坊口、大云桥等），其次是茶（59 次，涤园、大路、新河街等）。从食方面看，最常见的是面（吃面和饮酒往往一起）、馄饨（山阴县、聚丰园），偶见的有蛋卷（东昌坊口）、饼果子（购自上海春驹堂）、巧克力、豌豆、黄花麦果糕、牛肉、熏鱼、麂肉、猪头肉等。

与清玩等休闲娱乐相比，乡邦文献的阅读和整理更体现了传统乡绅对文化传承的关注。明清乡绅除了宣扬流行全国的儒学观念、朝廷规训，还专门建构本地的地域文化传统，推崇本地的乡贤、学术、文学等。对地域文化传统的建构和凸显，如乡邦文献的整理、乡贤祭祀的推广、乡里传统的标举以及文化流派的绵延等等，成为代代相继的事业，并形成了一系列通行的规范或章程。周作人自小便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自 1912 年开始，更是通过本地景仁堂、墨润堂等旧书店，还有王晴阳、金姓、范姓等书贾，除了清玩中的碑刻拓本外，还购买了大量古书，并且在地方报刊上发布《征求故书》的广告。他所收集的碑刻拓本还有古书，大部分属于乡邦文献的范围，如其后来所言“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①]。在涉猎的乡邦文献中，周作人推举雅俗两类传统，前者以明清小品笔记为代表，后者以《越谚》、民间歌谣为代表。周作人回忆，“小时候，我于乡先生中有最佩服的两个人：一是乌程汪谢城，一是会稽的范啸风”，“《湖雅》与《越谚》详记一地方的风物或言语，性质有点相近，但体例不大一样，前者略近《埤雅》《尔雅翼》，所谓亦雅诂之支流也；后者则全以俗语为主，随语记录，不避俚俗”[②]。汪曰桢、范寅均为近代文人，地位不同、影响不一，但正是这些“乡先生”构成的地方文化氛围，让他一开始便亲近看似迥异的两种传统。

从其民初日记中的购阅图书类型看，涉及近百种本省本府的乡贤文学，代表性的有《放翁集》《徐文长集》《陶庵梦忆》《文饭小品》《小柴桑喃喃录》《越缦堂文钞》等诗文别集，也有《全浙诗话》《会稽掇英总集》《禹域丛书》《越风》《上虞诗集》《越三子诗》等地方性总集。周作人除了购阅精英文学，还涉猎较为边缘的民间文学文集，如范啸风《越谚》、茹敦和《越言释》、章鞠僧《新年越中竹枝词》等。在乡邦文献购阅的基础上，周作人开始了先驱性的整理，如从《古谣谚》《越谚》中抄录有关作品。除了文献整理，周作人还注重现代民俗学的实地调查，在日记中出现了多处对本地歌谣、谚语、民俗的记录，如越谚“星月照烂堤不久晴”（1913 年 1 月 16 日）、“得

① 周作人：《文饭小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59 页。

② 周作人：《〈越谚〉跋》，同上书，第 124 页。

鸡一羽，越俗称记货兆者也 ”（1913 年 2 月 15 日）等。

总体来看，周作人的乡绅生活以地方为中心，如清玩、游赏、饮馔、文献整理的对象都是地方什物。当周作人过着乡绅生活时，也就进入了历代本地文人雅士编织的生活理想，也就是一种雅化和艺术化的安逸生活[①]。周作人虽然身处传统的因袭中，却依旧有独立的选择，表现出更平民化、学术化的理解和追求。乡绅生活的平民化，主要表现在对市井化、民间化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发现，如收藏习见的清玩、游赏城市的风景名胜、享受市井的美食、购阅晚近的民间文学文集等，确立另类的闲暇和趣味。乡绅生活的学术化，一方面受到传统乾嘉学术的影响，如对碑刻拓本、乡贤著作等乡邦文献的收藏和整理，另一方面受到民俗学等现代学术的影响，如对古迹的田野调查，对民间文化的热衷等。

三、地方性美学：地方文人、风土与文献的发现

地方性美学，试图在地方（地方世界的诸要素）与文学艺术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一尝试或努力，几乎贯穿了周作人整个的文学史观、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如周作人所言“ 我于别的地方都不喜欢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 ”[②]，亦如苏文瑜所言“ ‘ 地方性 ’ 是了解周作人美学观的关键，它是国家与作家的中介，因为它，国家民族与作家的联结才有意义 ”[③]。整体来看，在民初这段时间，周作人在文学与地方之间建立了初步的关联性，相关论述相对零散，却显示出了未来的若干趋向或线索。

《艺文杂话》《读书杂录》《一蒉轩杂录》等几组民初发表的专栏文章，是周作人对文学艺术集中的议论，也代表了他所依赖的主要文学资源。其中，《艺文杂话》和《一蒉轩杂录》，全是世界文学资源（以古希腊、英国、日本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为主），而《读书杂录》，全是地方文学资源（以金石文献、地方史志、游记小品等乡邦文献为主）。世界文学和地方文学，也构成了周作人一生建构文学理论和散文创作的两翼。

周作人最早从西方文学那里得到文学与地方关系的启示。如在翻译《黄蔷薇》时，提及“ 育珂生传奇之世，多思乡怀古之情，故推演史事者既多，复写此以为故乡纪念，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用理想亦不离现实，则较古为胜，实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也 ”[④]，其中出现了“ 乡土文学 ”一词。又如在研究童话时，指出地域（实为国度）的差异性，“ 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 ”[⑤]。此外，周作人还注意到诗歌的方言书写，如绥夫兼珂“ 所作诗，皆用故乡方言，叙古昔光荣及今日凌夷摧残之事 ”[⑥]，又如英国民国“ 多出于苏格兰，羼用方言，视若庞杂，然自有其特彩，趣味盎然 ”[⑦]。

当周作人开始收集本地童话儿歌时，特别强

① 葛兆光归纳士大夫官员的三件雅人逸事，“一是游山玩水访僧问道，二是吟诗作画校书读帖，三是搜集字画古书兼及会客应酬”。参见葛兆光《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 1994—2011》，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龚鹏程指出除了文学职业生活（文坛交游、文艺活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及诗酒酬唱、烟霞寄傲）外，还有艺术化的日常生活（赏花、品茗、焚香、饮酒、集古、弈棋等）以及世俗化的生活（衣食日用生活起居等）。参见龚鹏程《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96—297 页。

② 周作人：《旧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第 55 页。

③ 苏文瑜：《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陈思齐、凌曼苹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208 页。

④ 周作人：《黄蔷薇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217 页。

⑤ 周作人：《童话研究》，同上书，第 263 页。

⑥ 周作人：《绥夫兼珂》，同上书，第 303 页。

⑦ 周作人：《苏格兰民歌》，同上书，第 316 页。

调它们的地方特殊性，认为其“存越国土风之特色”，收集者应注明具体的地点和俗语[①]。他还指出方言的重要性，“亦有方言未见正字，而精意所在，不可移易，但应疏注而存之者，此采录童话者所应将意者也”[②]。

世界文学带来的是参照和启示，而地方文学才是周作人的精神归宿和创造基石。虽然周作人深受民俗学的影响，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擅长的是文献整理而非实地调查。他面向地方的《读书杂录》（22 则），整理和评价了大量乡邦文献，既有本地乡贤写本地的著作，也有外乡人对本地的记录，还有大量本地遗存的金石铭文。这些文献，全与乡邦或地方有关联，折射出作家关注地方的焦点。在包罗万象的地方世界中，周作人聚焦于人和物，具体而言是地方文人、地方古迹、地方风土等。

在地方文人中，周作人在意的是被忽略的人事，试图打捞地方的不同传统。周作人专门谈论了徐文长、王半村、范啸风，其中，徐渭是全国性的文人，而王濬、范寅是地方性的文人。周作人试图呈现一个被忽略的文学世界，对于声名不显的王半村、范啸风，或铺陈其命运，或推举其著作，如将范寅《越谚》誉为“空前之作”，“信口记述，不加改饰，至为有识”[③]。对于知名的徐文长，则注意其不为人知的轶事，将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与前代文人的记载相印证[④]。此外，周作人还专门记述关于乡贤的绣像书，如张岱《有明於越三不朽图赞》、任渭长《於越先贤像传》等。周作人特别看重传统理想的存续，如在面对辑录明代越地 108 位名贤事迹和画像的《三不朽图赞》时，称“先烈仪容，故自宛然，后生小子，时一展对，足以激发志气”[⑤]。

在地方古迹中，周作人在意古迹遗存（主要是名胜古迹和金石碑刻）的保存和整理，更看重保存和整理背后历代文人的精神印记。对于名胜古迹，周作人倾向于保持原状而非盲目变动，强调今人对历史的了解和共情，故批评对兰亭的修葺，“兰亭为古风雅之地，而以尘俗污之，山水虽灵，亦反为减色”，并区分世俗信仰和文人风雅，认为后世的世俗信仰是对前代文人风雅的扭曲和遮蔽，于是将古迹保存视为士人的责任，“世俗淫祀尚不足怪，独当地士夫充耳不闻，纵不好古，于坊里之事亦何忽不过问耶？”[⑥]对于金石碑刻，周作人用力最多，不仅为现存石刻编目，并且一一加以呈现。在呈现中，周作人更是深入本地金石学的传统，通过对历代地方文献的排列和分析，呈现金石碑刻的来龙去脉，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与历代文人的会心交流。如对于建初买山石刻，周作人引《越中金石记》介绍获石的缘起，继而摘录乡贤著作《娱园诗存》《蒿里遗珍》《春在堂随笔》等讲述后世人们的议论。

在地方风土中，周作人高举地志、游记小品等乡邦文献，凸显人文的名胜、风俗和自然的风景、物产。如评论《会稽三赋》，称扬的只是《会稽风俗赋》，认为“风俗一编最为详瞻”[⑦]，再如评论越中游记，历数张岱《陶庵梦忆》、王思任《文饭小品》、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祁彪佳《越中园亭记》等，不仅肯定其中所写的“风物”，并称扬其文笔之妙，尤其是对《陶庵梦忆》的推崇：“其书杂记江南风物，越中故实不及三至一焉，

① 周作人：《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292 页。

② 周作人：《蛇郎》，同上书，第 358 页。

③ 周作人：《范啸风》，同上书，第 404 页。

④ 周作人：《徐文长》，同上书，第 402 页。

⑤ 周作人：《三不朽图赞》，同上书，第 401 页。

⑥ 周作人：《越中名胜杂说》，同上书，第 430、431 页。

⑦ 周作人：《会稽风俗赋》，同上书，第 400 页。

然以文言道俗情，并冰爽绝伦，如握冰雪。读《龙山放灯》《越俗扫墓》诸篇，每为神往，想见明季奢华之状，令人感慨系之。”[①] 再看周作人选举的风土，有张岱的“越中故实”、王思任的“吾越诸胜”、李慈铭的“湖塘风物”、祁彪佳的“越中园亭”等，既有人文的名胜、风俗，也有自然的山川、物产。

上述言论不成体系，但提及的地方文人、地方风土、乡邦文献，却为周作人“五四”以来（自1923 年开始）的文学史观、文学批评和散文创作提供了最初的框架或原料，更为重要的是酝酿了一种观察古今雅俗的开放性视野。

在观察地方的文学世界时，周作人关注传统文人、乡邦文献和记忆中的风土，并寻出潜在的或偏门的文人及其文学传统，成为后来建构文学史的雏形。民初周作人提及的乡贤文人，集中于明清时期，又以晚明、晚清为主，包括晚明的徐文长、张岱、王思任、祁彪佳，晚清的李慈铭、范寅、俞樾（乡的范围，内核是山会，再一圈圈扩大，从绍兴、浙东再到整个浙江）。这些文人，成为周作人之后观察传统文学、重塑文学谱系的关键坐标。一方面，张岱等精英文人构成了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言志派、新俳文的源头。另一方面，范寅的《越谚》、徐文长的民间故事则构成了周作人整理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源。

周作人雅俗并重，在传统文化、地方文学中发掘雅、俗两大源流，并且雅中寻俗、以雅观俗，在精英文学中梳理有关地方风土的书写，从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考量民间、民俗的现代意义。他所注目的地方风土，兼顾人文与自然，成为其小品文创作的重要对象。自“五四”开始，周作人以自然名物、饮馔、风俗为题的小品文数量众多，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门类。在这些小品文中，相关的乡邦文献成为重要的引文或对话对象，如《娱园记》《娱园诗存》等构成了《娱园》（1923 年）一文的重要成分，构成了一种对照的传统记忆。到了“文抄公体”时代，这些乡邦文献甚至直接成了文章的题目，从《洗斋病学草》（1934）到《桑下丛谈》《旧书回想记》（1943），可谓蔚为大观。

民初，对于“五四”新文学先驱者都有着起点的意义。从民初到“五四”，他们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地方、边缘走向全国、中心的过程，其中，地方或边缘履历或多或少发挥着作用。周作人是其中的典型，他的地方经历和体验极为丰富，显示出显著的时代性和个性，并且在之后新文学理论、创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民初的地方自治、乡绅生活和地方性美学，构成了周作人一生志趣和艺术的“原型”。从新村运动中，可以看到现代地方自治理想的升华，从“自己的园地”“十字街头的塔”“闭户读书”“苦茶庵”，又显示出对传统乡绅生活的皈依，从 1920 年代《旧梦》《地方与文艺》《徐文长的故事》，1930 年代《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再谈俳文》，再到 1940 年代《桑下丛谈》等，种种彰显地方文人和乡土色彩的理论和文章更能看到其地方性美学的延续和成熟。

作者简介：

冯仰操，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文化、文学转型。

① 周作人：《越中游览记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第 435 页。